

中国减贫的西海固报告



新华社银川6月21日电(记者陈晓虎、邹欣媛)西海固,山大沟深、干旱少雨,一度被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除掉西海固贫困的标签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和尚头”到“山川绿”,从“讨要吃”到“仓廩实”,从“靠穷富”到“比着干”,从“谋扶贫”到“求振兴”,西海固在精准脱贫的道路上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

随着盐池、彭阳、隆德、泾源脱贫“摘帽”,西海固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27.3%降至2018年的4%,告别贫困进入倒计时。

破解“生态贫困”

“今日山崩变平川,层层梯田如牡丹;不见昔日和尚头,美化山川万古流。”在彭阳县姜洼村,85岁的刘发明望着绿染的山岭,脱口而出自己的诗词,让跨越世纪的巨变如影像般闪现眼前。

彭阳曾是西海固生态最脆弱的地方之一,1983年建县之初提出“生态立县”,几十年整地造林,一张蓝图绘到底,如今这里山花遍野,草木葳蕤。自今年清明节以来,到彭阳赏花的游客达2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8亿元。

西海固是宁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囊括了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彭阳县、泾源县,以及中卫市海原县和吴忠市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区9个贫困县区,宁夏现有的12.1万贫困人口中仍有8.9万人集中于此。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海固“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耕种山梁峁,刮风浮土跑”。1972年,国务院调查组一份报告中写道:西海固群众生活仍然十分贫困,不少人家无隔夜粮,冬天没有御寒衣。1982年,西海固山岭大多赤裸,贫困面高达80%以上。1994年,西海固贫困人口达140万人。2000年,西海固贫困人口还有100多万人。

19年的退耕还林还草,16年的封山禁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西海固持续实施重大生态工程。2017年以来,固原市以不怕试错的决心,建设了129个“一棵树、一株苗、一枝花、一棵草”的试验示范园,在17万余亩土地上试种309个品种。到2018年底,仅固原市的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12.8%提升至25.1%。

仲夏时节,固原市不少地方绿意盎然,小动物不时窜出林子,叫不上名字的鸟儿尽情欢唱,偶尔还会迎来游荡小雨。

好山好水方相宜,修水库、疏河道,关停沿河污染源,固原市自2017年启动清水河、葫芦河、渝河、泾河、茹河“五河共治”,促进了山水田生态一体建设,再现清流潺潺,水鸟竞飞。

出固原进入宁夏中部干旱带,盐池县成片的沙地已是绿荫层叠,同心县在“火星地貌”上成功试种文冠果树。这些绿来之不易,风景般动人,滋润着黄土高原,带来发展的希望。同心县旱天岭村村支书丁建华兴奋地说,从60毫米到120毫米,全村的年平均降水量整整翻了一倍!记者看到,一大片枣林长势喜人。

“走出生态破坏—干旱少雨—贫困落后的恶性往复,走向生态优先—造林还草—绿色发展”的良性循环,是西海固甩掉穷帽的根本出路。”自治区党委常委、固原市委书记张柱说,固原市在政府搭台、科技支撑的前提下,以企业牵引带动农户参与,增强“市场嗅觉”,打造农业“前店后厂”,走上生态建设与脱贫致富结合的“绿色+”之路。

探寻“蓄能产业”

自原州城区驱车翻山越岭1个多小时,才到炭山乡南坪村,村庄民居焕然一新,老百姓养



▲六盘山下盛开的油菜花(5月17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冯开华摄



▲宁夏海原县曾经恶劣的自然条件(2011年8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牛、喂羊,自得其乐。

炭山是原州区脱贫的“老大难”,而南坪是炭山最大的村,过去这里干旱、偏远,没产业,许多人只好外出打工。

来到回族老人马木山家,上房整洁干净,炕桌上摆着馓子、油香。“小时候经常外出吃饭。现在快70岁了,还能养4头牛,10几只羊呢!”老马说。

上世纪90年代,南坪只有几十头黄牛,随着草畜产业政策到户,全村目前存栏2000多头。

南坪村是西海固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固原市农业农村局调研员张和广说,近年来,草畜、马铃薯、冷凉蔬菜等成为固原主打特色产业,仅去年全市肉牛饲养量达110万头,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养牛5头。

突破“不可能”即为“可能”,西海固一些县区在扶贫产业上尝试引种新林果和高附加值农作物。大果榛子、蜜桃苹果、俄罗斯沙棘等在固原长势旺盛;2017年以来同心县下马关镇成功试种2000亩芦笋,在当地农业史上从无记载。下马关镇党委书记董占平说,通过企业“流转土地+品种引入+节水灌溉”,富硒芦笋亩均收益5000多元。

原州菜心直供香港,盐池滩羊成为地理标志农产品,红寺堡黄花菜流通各省……从小打小闹到规模推进,西海固因地制宜的产业扶贫路子,迈向纵深。

西海固慢慢成为众多客商青睐的优质生态农产品基地。5月的一天,记者在盐池县青山乡采访时,碰到南宁的客商姚茂强,他是第二次来订货。“由于光照好,虫害少,宁夏的黄花菜、辣椒等农产品在南方市场很受欢迎。这次来是想推广市场化种植,让当地农民从种什么卖什么变为需什么种什么。”姚茂强说。

固原市委副书记杨刚说,固原正谋划推进农业产业规划和品牌推广,创新完善减贫利益联结机制、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加快农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

受制于缺水,固原市主导发展轻工业带动农民进城就业。走进位于固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纺织车间,工人正熟练操控现代化纺纱设备。宁夏丰源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官波说,明年20万锭纺纱投产后将解决2000多人就业,其中大部分是建档立卡户,随着纺织产业扎根,织布、制衣等一批企业也将聚集固原,形成抱团效应。

张柱说,引进企业以工富民的同时,政府要发挥帮扶单位的“巧劲”,挖掘消费端潜力,变“给资金”为“下订单”;营造“一站式”服务营商环境,吸引更多轻工企业来投资建厂,让更多贫困户变成产业工人。

力拔“精神穷根”

对照“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清单”,宁夏各级帮扶干部以勤恳、负责的态度,点燃西海固老百姓奋斗脱贫的热情。

在西吉县新庄村,聊到开心处,62岁的脱贫户袁启存从背后亲切地抱起了驻村第一书记王元明。“党的政策这么好,日子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精神得很!”

和王元明一样,2000多名驻村干部犹如灯塔,照亮了贫困村前行的路。王家的狗、马家的羊、谁家的养牛贷款到期了……西海固驻村干部大都熟谙于心。

西吉县委书记王学军说,贫困户主动发展种养产业,政府各项到户补贴至少2万多

元,户均贷款达4.9万元。老百姓的经营性收入显著上升,贫困村处处都有“精气神”。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隆德县残疾人托养中心,一幅写有“我希望早上叫我起床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的书法作品,触人心弦。在这里,100多名重度贫困残疾人不只是被政策性托养,他们心怀梦想,为之奋斗。

托养中心除了配有残疾评估、理疗等现代化康复教学设施,适合残疾人工作治疗的电子商务中心、人造花操作室也让人印象深刻。“我们的宗旨是:托养一人,解放一家,脱贫一户,幸福一生。”隆德县残联理事长彭云珠说。

沙塘镇魏李村村民李佳从小患有脑瘫,没上过学,过去闭门不出。来到托养中心后,他努力学习,认识了很多字,已经是电商中心的“首席美工”,每月工资近2000元。24岁的他自力更生,如今谈着恋爱,想有个家。

扶贫工作不能干部一头热,归根结底要激发老百姓“想学、要干”的动力。过了晌午,原州区头营镇石羊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没结束烹饪雕花技能课,下节课的学员已经赶来。

“4月以来,像这样的课程已经开了两期。”原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武殿盛说,各乡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脱贫富民为主线,在课程设置上融合理论宣讲、技能服务、便民综合等6项服务,采取积分制爱心超市奖励办法,老百姓参与劲头很足。

铺就“振兴之路”

天高云淡,鸟鸣山涧,屋舍俨然,花木欣欣向荣。行走在泾源县兴盛乡红旗村,不禁感叹,这个六盘山下偏闭塞的小村庄,如今已成诗意栖居的美丽乡村。

记者采访时,正赶上由3名村干部组成的评分组入户打分。走进一户正在装修的人家,门框旁贴着“较清洁”的标签,院内有些杂乱。评分组成员、村支书于建英忍不住唠叨着,“院子清扫不及时,这次评‘不清洁’”,被点评的村民有些难为情。

不怕贴的标签被撕了?“不怕!谁要是撕了,我们就上传村容村貌微信群,谁还不顾个脸面?”于建英说,以前哄着、求着老百姓干,现在靠“入户评分,集分奖励”来引导。

山变绿,路变平,产业兴旺,村庄变美,“脱贫摘帽”的乡村正在内外兼修,擦亮乡村振兴的生态底色。

肉牛满圈,牛棚里为何不难闻?泾源县龙潭村村民治三成笑着指给记者看,秘密就是“生态牛床”,原来在牛棚里铺垫了50厘米混合木屑和生物菌种的垫料,牛活动时使垫料与粪尿发酵,牛棚干净少味。

“生态牛床”成就了农村有机农业产业链。泾源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小飞说,泾源县丰富的林草为牛床垫料提供了大量原料,木屑与牛粪在牛棚中经过几个月发酵后,清理出售给加工有机肥的扶贫车间,有机肥再还田,有效带动有机农产品种植。

红瓦白墙,绿树掩映,美丽乡村开门迎客。在红寺堡区永新村智慧民宿,独立的厨房、主卧、次卧围成一座院,燃气灶、冰箱等电器齐备,厕所也采用水冲式。去年,红寺堡举办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期间,这些民宿成为参赛选手的首选住地。“当时在这儿备战的3支队伍拔得头筹,大家载歌载舞,热闹了一晚上!”永新村村支书李文彬说,刚开始没人愿意当民宿,去年老百姓尝到甜头,今年报名的特别多。

贫困村脱贫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返乡创业,为“自己出生的村庄”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大学生陈泽恩从重庆回到彭阳县小石沟村,发展“互联网+土蜂”养殖产业;西吉县焦建鹏从银川回到龙王坝村,将民房变客房,把农民培训成导游,龙王坝已成远近闻名的“美丽休闲乡村”;从海原县老庄村走出去的郭鹏飞回乡创办电商平台,在银川建立社区零售店,家乡的马铃薯、香水梨等农产品直达市民,带动100多个贫困户的产业发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者刘慧、罗沙)科创板开市在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21日发布,意见对于公众关心的科创板诸多焦点问题,均作出了针对性的回应。

虚假陈述、欺诈发行怎么管?——严格落实发行人及相关人员第一责任

意见要求,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发行人从事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的,依法判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向投资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有效改善市场乱象中相关责任主体违规成本过低的问题。

对于科创板改革来说,信息披露是各方参与市场博弈、发现科创企业价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生命线”。在注册制试点的背景下,虚假记载、欺诈发行对于正常市场秩序破坏巨大。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指出,民事责任的追究,是促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尽责归位的重要一环。意见对欺诈发行进行了明确界定,同时还对发行人、保荐人、证券中介机构的信息披露民事责任追究,进行了体系化规定,严格落实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的第一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提出,在审理涉科创板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中,应当审查的信息披露文件,不仅包括招股说明书等常规信息披露文件,也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审核问询的每一项答复和公开承诺。

专家指出,根据意见,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不仅要审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还要结合科创板上市公司高度专业性、技术性特点,重点关注披露的内容是否简明易懂,是否便于一般投资者阅读和理解。

如何提高科创板市场违法成本?——多维打击证券犯罪,强化民事赔偿

在科创板改革中,如何提高市场违法成本备受各方瞩目。最高法二庭庭长林文学介绍,本次意见主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是构建多维度打击证券犯罪机制;二是用足现有法律制度,强化违法违规市场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

意见规定,在刑事审判方面,将依法从严惩治发行、注册等环节的各类欺诈和腐败犯罪。对于发行人与中介机构合谋串通骗取发行注册,以及发行审核、注册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或接受利益输送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从严惩治违法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内幕交易等金融犯罪分子,严格控制缓刑适用,依法加大罚金刑等经济制裁力度。

林文学表示,根据科创板信息披露特点,意见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了系统规定。“为及时使违法违规市场主体付出法律代价,意见还要求,各级法院加大对证券行政处罚案件和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力度,发挥好司法强制执行的震慑效应。”

此外,为配合监管部门防止资金违规入市助涨助跌,意见还明确提出,对于未取得特许经营许可的互联网配资平台、民间配资公司等法人机构与投资者签订的股票配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如何维护投资者权益?——完善诉讼体制机制,降低诉讼成本

对于即将开市的科创板来说,能否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直接影响股民信心和预期。

担心券商忽悠股民乱买科创板股票?意见明确规定,对于证券公司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审查、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义务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投资者合法权益受损,打官司成本太高?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体制机制,降低投资者诉讼成本。具体包括:

——立足于用好、用足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对于共同诉讼的投资者原告人数众多的,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

——探索行政处罚、刑事罚金优先用于民事赔偿的工作衔接和配合机制。

——研究探索建立证券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

“在证券民事诉讼中,相对于违法违规主体,投资者在取得和控制关键证据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林文学说,意见要求,各级法院探索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方便投资者的代理律师行使相关调查权,提高投资者自行收集证据的能力。

如何约束特别表决权股东滥用权力?——依法否定行为效力

“同股不同权”是科创板改革中的重要探索创新,符合市场规律。但也有人担心,科创板上市公司中可能存在“少数人控制”“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问题,以公司自治方式突破科创板上市规则,侵犯普通股股东合法权益。

对此,意见给出了明确答案: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否定行为效力,禁止特别表决权股东滥用权利,防止制度功能的异化。

刘贵祥介绍,案件审理中,要准确界定特别表决权股东权利边界,坚持“控制与责任相一致”原则,在“同股不同权”的同时,做到“同股同责”。

此外,意见还指出,对于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责任主体,即使履行了法定公司决议程序也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苏维埃血脉”

在长汀解码“中央红色交通线”

新华社福州6月21日电青砖道,木房屋,步入福建长汀县汀州镇五通街113号,这座80多年前的中华苏维埃福建省邮务管理局旧址散发出厚重的历史气息,仿佛低声轻语一段隐秘而又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

1930年至1931年,为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中央交通局以闽西苏区的“工农通讯社”机关交通树为基础,建立了一条串联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

的交通线,即“中央红色交通线”。

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福建省邮务管理局在长汀改设成立,形成以汀州为中心的红色邮路网,解决苏区信函往来、运送地下工作人

员、传输与转运重要物资。

被称为“红色小上海”的长汀交通便利,是闽粤赣三省的古道枢纽和边陲要冲。汀江绕城南流,航运发达,使长汀成为闽西、赣南各县的物资集散地。

“当年,中央红色交通线运输物资最主要是通过汀江航道,这条水路是最便捷快速的路线。”生于长汀的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研究者王坚说,此外还有陆上交通路线和丛林交通路线,但都面临更多国民党军及民团封锁压力,行进速度缓慢。

在路上和丛林里,由于敌人封锁,交通运输人员有村不能进,只能绕着走,白天不能走,只能晚上摸黑走。他们常常要翻越人迹罕至的茂林峻岭,为防止敌人发觉,还要注意消除走过的痕迹。苏区严重短缺,交通运输员们常常在执行护送人员及传递情报的任务时,还要把盐捆在身上,日晒雨淋,被汗水和雨水融化的盐黏在身上,令人感觉异常难受。

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党的中央机关安

全转移到中央苏区,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无线电设备、技术人员和文艺工作者被安全护送到中央苏区,苏区300万人民需要的大量食盐、布及其他紧缺物资也被护送转运到中央苏区。

为了支援前线,支援红军、支援苏区的革命斗争,当地百姓不仅用贡献物表达对人民军队的热爱,还积极投入到输送物资的队伍中。据统计,1931年4月至7月,长汀、连城两县曾组织40至50岁的男子成立运输队,配合红军作战,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到前方。

该渡口曾是汀江水运、陆运交接的重要关口,当年是红军部队辗转作战的交通枢纽,承接了人员、物资的传输、转运,是一个重要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水陆交通中转站。

据王坚介绍,苏区时期,附近村落里有红军的樟脑厂和硝盐厂,生产的物资通过这条

汀江运往各方向的红军主力军团,而当时苏区有毛边纸、钨矿、木材和谷米等产物,也多通过这条水上航线运往白区进行贸易,再购回苏区所需的重点物资。

在中央红军主力1934年10月长征前夕,水口等村依靠撑船工人多,组织了一支“河流游击队”,抢运粮食和其他一大批革命物资到濯田,再肩挑到四都,有力支援了革命斗争的开展。

“红色后代”、原汀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赖兴银的孙子赖光耀说,曾是运输队一员的奶奶在红军长征前日夜兼程挑粮,运输物资,每天要挑两担粮食,走60公里路,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又继续为当地游击队运粮。

“年轻时走路用膝盖太多了,结果奶奶才60多岁就走不动路了。”他说。

江水奔流不息,青山连绵不绝,“中央红色交通线”宛如跳动不止的血脉,滋养着苏维埃共和国,滋养着红军革命的队伍。(记者刘斐、李松、梅常伟、刘羽佳、吴剑锋)

